

Column

■由此及彼

上海市场缺失“高增长板”

◎ 闻岳春
金融投资研究学者、教授、博导

中国究竟怎样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专家们列出了种种选项。今天我想补充一点：多层次资本市场不能遗漏了高增长板市场。

目前上海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只有主板市场，缺失高增长板市场。这种单一的市场机构不能为处于各种发展阶段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足够的支持。如果上海有了像预科班那样的“高增长市场”层次，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全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合，可以为多阶段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服务，为上市公司提供便捷的升降机制，改善公司内部经营机制，加速高科技企业的成长。

近年来，上海高科技项目数量增长，每年吸引的创业投资项目和资金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上海已有多家高科技园区，已经和正在形成的就有漕河泾高科技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现代科技园、中国国际纺织科技城、嘉定民营技术密集区等高科技园区。到目前为止，上海已成立了杨浦创业中心、慧谷创业中心、同济大学科技园、东华大学科技园、上海大学科技园等。

此外，“长三角”地区已经和正在形成的高科技园有：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江苏兴化科技工业园、南京雨花科技园(预计2010年基本达到300家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国内最大科技园)、江苏张郭科技园、江苏海菲医药生物科技园等。

而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面临着融资困境。现在虽然有政府创新基金，但“粥多僧少”，供不应求。去年，上海共有163家企业项目获得了科技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及资助金额，平均每项得到47.5万元。因此，处于种子期或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仍主要诉求于风险投资。

从银行角度来看，如果获得贷款的高风险科技企业的项目开发成功，提供贷款的银行除了得到正常的贷款利息外，得不到任何额外的风险收益；而如果企业开发失败，银行则要承担全部贷款风险。而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贷款额度小得多，而银行对于两者所花费的贷款审查费用是差不多的，从而银行宁愿以较低利率贷款给大企业。

纵观国内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巨大市场份额的一些外资银行已比国内银行先行了一步。例如，渣打银行已推出“中小企业无抵押小额贷款”，无需任何抵押，贷款期限达36个月，贷款金额可达50万人民币。但是，为了降低风险，该类业务规定了公司成立至少3年、营业额在200万元以上等审核条件。这又将一大批处于初创期的高科技型中小企业拒之门外。

正在飞速发展的上海风险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但他们苦于退出渠道的缺失。上海市统计局和上海市创投行业协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询问被调查单位“进一步推进创业投资发展的制约因素”时，有62.2%的创投机构认为“目前没有完善的创业投资退出机制”；45.1%认为“金融市场不发达”。这些制约导致大量创业投资基金沉淀在投资项目上，造成创业投资机构的资金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从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和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定位看，开办高增长板市场，上海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条件。上海目前所具有良好的金融环境和基础，是内地其他地方所远不能及的。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国际型证券交易所，当然会继续扎根在上海，这是由中国大的经济布局所决定的。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中，上海已经而且必将获得中央政府和各方以及政策的有力支持。

更紧要的一条是，上海有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2000年修订的《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若干规定》，对上海创业投资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6年，上海市政府在发布的《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中，明确提出要改善投融资环境，以加快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一些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地方性法规随之在进一步拟定和修订中，例如：《上海市创业投资基金条例》、《上海是科技投入条例》、《上海市科技企业产权界定条例》、《上海市技术秘密保护条例》、《上海市政府采购条例》等。

笔者认为，在设计上海高增长板的时候，应充分借鉴交易所的“高增长层次”的做法及其与纳斯达克市场关系处理的经验，力避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理顺与未来的深圳创业板、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其他多层次市场的关系，集中有限的金融资源将上海建设成名副其实、功能完整的国内、国际金融中心，以促进国家整体经济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发展。



■大西洋边

德式共决制遭德式腐败致命一击

◎ 张祖谦
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德国北部城市不伦瑞克1月15日突然吸引了大西洋两岸众多媒体的关注视线：该市的法庭这天正就2005年曝光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腐败案再度举行听证会。此案涉及德国经济界一些重量级人物——德国最大国有企业大众汽车公司的多名高层管理人员，案件的“八卦”细节经新闻记者生花之笔的渲染，早已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经久不衰的话题；德国颇有特色的共决制居然成为腐败分子以权谋私、巧取豪夺的工具！

共决制是德国社会经济模式的重要内容 and 标志性特征，其宗旨是通过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来协调劳资关系，特别是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德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职工人数在5人以上，且其中3人拥有(职工代表)被选举权资格(年满18岁和在本企业工作满6个月)的企业，都需设立包括职工代表的监事会(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董事会；德国企业董事会则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经理层)。监事会成员分别由企业股东大会推选和劳方委派。监事会主要职责是任命董事会成员，并监督董事会执行业务。

监事会内的职工监事，除了像资方监事一样要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重要的决策，还要关心企业的职工切身利益的事务。例如，监督企业对有关涉及职工权益的法律、条例、集体合同等的执行情况，对企业的设备更新、人员调配等提出咨询和建议，参与对工时、报酬、休假、劳动保护、职工培训等问题的决定。

在很大程度上，共决制是德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和德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成果，虽然它远不是能够让德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理想制度，但它对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有作用的，因而对协调德国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对德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劳资矛盾也日趋尖锐，对德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社会主义思想也在德国深入人心。德国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目的出发，开始思考如何缓解紧张的劳资关系。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主张“国家通过爱国主义的纽带将其成员结为一体”；政治家卡尔·格奥尔格·韦奈尔布莱歌等提倡改革企业内部制度，建立“经济联邦主义体制”，以“劳资对等”组成的劳动组织管理生产过程。一些德国企业家尝试建立“劳资共决组织”。“莱茵纺织大王”奎林·克龙组建“劳动者阶层福利中央委员会”，让工人参与储蓄、养老等基金管理。纽伦堡的印染厂主卡尔·德根科利布创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委员会”，以“维护与执行工厂规章和协调争端”。

■知无不言

30年艰难跋涉：私权理性扩张

◎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年末岁初，是总结与畅想的时刻。今年对中国来讲，有些特殊，更值得总结。当“中国话题”再度成为全球热点时，我们都明白，这主要源于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所以，如何总结这30年，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的持续发展，以及能否扩展对世界的贡献。

只要看看现今的吃穿住行，就知道我们正受益于过去3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故而每当有朋友抱怨工作越来越不好应付了，不仅有着各种各样的考核与竞争，还有着更高质量诱惑的压力之时，我总要反问：如果不是这样，哪来这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呢？因而，过往的高增长是每个人越来越努力付出的结果，跟每个人有关！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是人们越来越主动努力付出并更多享受自己付出成果的过程，则完全可以肯定，这也是一个私权持续理性扩张的过程，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这便是3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如果认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尚有很长的道路，那就不能否认，私权还有很大的地盘要退让，还有很多新的“门楼岗哨”要去充实并尽职。

■知无不言

私权理性扩张

从经济学上说，想要人们主动付出，除非能使其获得高于付出的利益。越来越努力地付出，总要有持续净利益及其强烈预期相伴，而付出与否的自由及其利益的获得、占有、支配与处置，是每个人的基本经济权利，属于私权范畴。如果说，30年改革开放是人们越来越主动努力付出并更多享受自己付出成果的过程，则完全可以肯定，这也是一个私权持续理性扩张的过程，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由此，要我说，这便是3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

我这样说的首要理由是，能否拥有必要的、可得到保障的私权，实在是财富增长和积累的基础性条件。君不见，在公权覆盖一切而不承认、更不保障私权的时代，每个个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与热情都被埋没了，没有自主选择的空间，更没有竞争的压力与动力。因为人的天生与后天的禀赋和才能，得不到任何显现机会，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块整齐划一而同质性的铁板。没有差异的世界，必然就没有活力与色彩，也必然因为财富创造动力不足而陷于普遍贫穷，并且还越来越封闭并充斥着自欺欺人。所以，私权的理性扩张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

其次是我们看到，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恰恰是走着一条承认并推动私权扩张的道路。1978年的改革起始，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责任制”的另一面，正是认可了农村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经济主体性，承认并保障了这一主体自主生产经营的权利。因为，这一改革打破了以“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为单位的“大锅饭”式集体体制，而相对这种“集体体制”的公权性，家庭与农民个人是最起码的私权领域。当农村家庭获得自主生产及其剩余成果享有权利后，他们深深看到了付出越多，产出越多，上交集体定额“公粮”后归自己所有与支配的剩余成果也越多的事实。所以，这一仅仅是恢复了农民起码私权的改革，便在中国农村与农业爆发出了难以想象的活力，农业产出空前提高。只过了五六年，农业的恢复与稳定就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腾出了空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也是从承认企业作为工商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利益自主权开始的。无论是利润分配、税利分流、承包制，还是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股份制改造，都是为了体现对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与此同时，在农村乡镇企业掀起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中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也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并成长。

正是在这种对城市个体的财富创造与积累权利归还的公权后退过程中，在私权理性恢复的大环境下，城市经济得以蓬勃发展。城市工资改革、住房改革随之顺利推进。工资涵盖范围不断拓展，不再仅仅是简单再生产的补偿，吃穿住行与发展性支出逐步被——包括在货币化的薪酬中，这更有利于价格机制得以健全并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使得个体对政府公权安排的过度依赖中解脱了出来。人口与劳动力流动已不再是政府行政安排的结果，而是市场化自主决策的过程。人们越来越多地有了属于“私人”性质的产权和“财产性收入”，有了家庭与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城市生活因此才有了今天这般个性张扬、活力十足而又丰富多彩的局面。

如果你认可上述是一个私权理性扩张的过程，想必你也会同意这是个由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结果。正是过去30年间一系列针对农村集体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国有企业制度、贸易制度、分配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财产制度等方面的变革，才推动并保障了私权的逐步恢复与扩大。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制度优于发展。

但私权的理性扩张，并不意味着公权的消失。只是，公权应当将其原本属于私权的“堂屋”让出来，专用于其应该呆的“门房”，当好管家护院的角色。其实，随着以私权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权的责任领域也在不断创新并变得更加重要。比如，如何确保个体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确保正当有序的竞争环境，确保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与灵活，以及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与增强国际竞争力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国际环境，都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权所必须担负起的责任，也是公权尽显能力的权利体现。当然，这又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和完善作为保障。

如此看来，就今后发展而言，如果要保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应该将继续推进私权理性扩张作为一种共识，予以理论与实践政策上的明晰化和具体化。换言之，如果你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尚有很长的道路和任务，那你就不能否认，私权还有很大的地盘要退让，还有很多新的“门楼岗哨”要去充实并尽职。

看看所处环境，体味真实感受，相信各位会赞同我的观点，对吗？

现在的问题在于，本应主持公道和维护法律尊严的德国司法部门似乎也“默认和接受”了这样的“潜规则”。福格特在为自己辩护时，除了强调“没有索贿”(言下之意是“不拿白不拿”)，还振振有词地辩解：自己“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看来，他完全忘记了他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但是法庭也没有驳斥他的无理狡辩。在福格特的辩护律师对判决结果预计乐观时，失去职工监事保护的德国工人只有大感悲观了。

■德鲁克在中国

联想战略新规划从“放弃”开始

◎ 黄建东
德鲁克管理学院

在春节前由百信手机网、人民网手机频道、天极网联合举办的“2007年度国产手机总评榜”上，2007年国产手机的七类大奖共计27个奖项最终归属九家品牌的27款国产手机，联想取得了三个第一、三个第二。

这个结果，说明联想在手机行业内做得很不错。不想，才过了几天，联想集团宣布，将以1亿美元的价格把旗下手机业务资产——联想移动转让给私募基金。于是，各种猜测接踵而来——有的说这是一项“左手换右手”的交易，有说这是为了“摆脱这个颓势明显的‘包袱’”的，也有说“联想此时选择舍弃手机业务的‘鸡肋’也是形势所迫”，有说“联想集团实现了手机业务的剥离，减轻了财务报表上的拖累”的，也有说“通过股权变换使联想移动更加独立，为今后独立上市铺路”的等等，不一而足。

一个企业的一个举动引来那么多的关注，除了联想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司外，更因为联想的这一举动勾起了一个中心话题：中国企业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并且运作自己的战略规划？

不论联想转让了手机业务以后将会怎样动作，有一点已经明确无疑：联想将采取和以往不同的策略。这又是联想新的战略规划的开始。而这一次的规划，又是从“放弃”开始的。

德鲁克曾说：“规划工作起始于企业的目标。在每一个目标领域，都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实现我们未来的目标，我们现在必须做些什么？’为了实现未来的目标，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始终是‘摆脱过去’。绝大多数规划只涉及必须做的新增事物——新产品、新流程和新市场，等等。但是，在未来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关键在于摆脱不再具有生产率、陈旧的、失效的东西。”

联想2005年1月宣布它将收购IBM PCD时，国内很多人都用“蛇吞象”来形容它的举动。实际上，在此之前，联想已经历了“多元化”、“国际化”等过程。在联想实行多元化的时代，曾试图通过大力发展互联网、服务等业务来成为“像IBM一样的服务提供商”，像“思科一样的网络设备提供商”，“像美国在线一样的网络运营服务商”，“像雅虎一样的网络内容提供商”。它曾经学习IBM和惠普向服务型转型，学习三星和索尼向家庭综合娱乐进军，学习英特尔、微软向核心技术突破。在那个阶段，联想试验一种新的做与过去不同事情的策略，但最后证明在新的领域内，联想都未能有大的作为。

2004年制定新三年规划时，联想决心改变自己摇摆不定的做法，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第一类业务”即核心业务——个人电脑及相关产品，其中包括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外部设备等等业务。同时，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通讯设备则列为二类业务，而早先提出的包括“IT服务”、“互联网产品”之类的“新”战略已经暂时性地退却到了“第三类业务”中。此后，联想的电脑业务重新得到了发展。

按照原来的部署，2008年是联想集团将Think系列产品从IBM标识全面过渡至Lenovo品牌的元年；作为北京2008奥运会的赞助商，今年也是联想品牌在国际舞台上需要有突破的一年；因此，联想把原来“第二类业务”中的手机股份转让，把资源集中到核心业务上，应该说是明智之举。

联想的这个选择，用德鲁克的话来说就是：“高效的管理者深知，他们每天必须高效地处理很多事务。为此，他们必须要专注。专注的第一法则就是要抛弃‘行将就木’的过去，要立刻把组织内部最有价值的资源，尤其是弥足珍贵的人力资源从无效的领域中释放出来，并投入到充满机遇的未来中去。如果管理者不能摆脱过去的羁绊，抛弃过去，也就不能创造未来。”

联想几年前的战略调整，使得联想专注于电脑事业，从而出现了“蛇吞象”这样中国企业史上的壮举。现在，联想转让其手机业务，不管其股权变化如何，都可以使联想更加专注于它的核心业务。

事实上，这也是联想的真实意图。根据杨元庆的想法：“联想出售手机业务，使现有管理团队更专注于核心的PC业务上。并购了IBM PCD业务之后，中国以外只有5%以上的市场份额，成长的空间很大，联想会争取在全球市场都有所作为，因此才考虑更集中精力在PC上。”

“放弃”与“集中”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要想“集中”于核心业务，必须得学会“放弃”。“集中优势兵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等军事思想，同样适用于企业经营。联想进入21世纪以来的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及其不同结果，也都说明了“集中”与“放弃”的原则在企业规划和经营上多么重要，在运用这个原则的时候又多么不容易。